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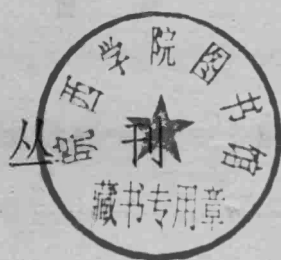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

丛刊

3

1991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3

1991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一年 第三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93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9 定价：3.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1年第3期 (总第48期)

目 录

·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 对于鲁迅研究的若干思考····· 林 非 (1)
- 近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新趋向····· 钱理群 (17)
王得后
- 无物之阵：语言游戏的迷宫
——论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薛 毅 (37)
- 《鲁迅传》增订后记····· 林志浩 (57)
- 《鲁迅名作鉴赏辞典》编后记····· 王景山 (61)

· 文学史观讨论 ·

- 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黄修己 (66)
- 文学史观讨论答问····· 殷国明 (77)
- 一份“文学史观讨论”的答卷····· 朱德发 (83)
- 谈文学史的编著问题····· 俞元桂 (96)

· 当代作家谈现代作家 ·

- 作家接受作为一种“读者效应” (代编者按)····· 吴福辉 (101)

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	莫言 (107)
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	刘震云 (112)
郁达夫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特征·····	雷建政 (115)
识萧红·····	李平易 (120)
穆时英小说人物原型简析·····	王连生 (124)

· 作家作品研究 ·

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模式·····	王春林 赵新林 (129)
师陀的乡土小说：“浮世绘”——咏叹调·····	王培元 (145)
论《十八春》·····	金宏达 (161)
徐志摩的“洋”与“土” ——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与新月派之二·····	张玲霞 (175)

· 郭沫若研究 ·

旧形式的诱惑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	刘纳 (188)
郭沫若的“我” ——兼谈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	李今 (203)

· 现代作家传记研究 ·

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陈思和 (216)
人·环境·再创造的雄心 ——从《沙汀传》说到作家传记的写作·····	董炳月 (232)

女性作者描述与世纪同龄的女性作家

——读《冰心传》……………冯志伟 (241)

· 学 人 述 林 ·

陈瘦竹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研究的贡献……………朱栋霖 (247)

· 资 料 ·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中的三个词条正误……………丁景唐 (262)

简谈“左联”和三十年代云南文学……………蒙树宏 (270)

《选民》(《文博士》)应是未完成之作

——兼论此作究竟有没有“初版”?……………史承钧 (283)

“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瞿秋白《那个城》考释……………唐天然 (292)

· 论 文 摘 编 ·

历史理性的个性演示(丁亚平, 298) 对蹠的逆向轨迹——周作人与闻一多文化心态比较(李晓航, 299)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孔庆东, 301) 三、四十年代曹禺和夏衍的剧作比较(韩日新, 303) 试论鲁迅道德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史志谨, 304) 三十年代小说中“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丁帆, 306) 生的苦闷与性的躁动——郁达夫小说性爱心理透视(谭贻楚, 307) 半开的樊笼——从老舍的《离婚》到谌容的《懒得离婚》(吴小美、魏韶华, 308) 茅盾小说人物塑造模式论(秦志希, 310) 同途殊归两巨人——鲁迅与胡适(陈漱渝, 311)

· 新 书 林 ·

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炳, 65) 闻一多研究文集(金筌, 82)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论(孔泉, 111)

(312) 零附录 (261)

更正..... (261)

编后记.....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313) 附录..... (313)

对于鲁迅研究的若干思考

林 非

一 简略的回顾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异常光采夺目和扣人心弦的巨大现象，在他自己开始从事这方面活动的初期，就立即受到了瞩目和注意。

以小说部分而言，《狂人日记》发表后不久，就被认为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记者：①《〈新青年〉杂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接着又引发了吴虞的撰写《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这是文学创作在风起云涌的启蒙主义思潮中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好例证。胡适则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指出“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茅盾更进一步认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除了欣赏赞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雁冰：《读〈呐喊〉》，1923年）。这些虽然只是鲁迅研究的初步开始，却至今还对我们具有启迪的意义。

以杂文部分而言，当鲁迅最初的篇章刚披露之后，傅斯年又认为“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而“《新

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随感录(四)》,《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林语堂进一步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而且大约是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鲁迅》,1929年)。茅盾则认为鲁迅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还认为“攻击老中国的国疮的声音,几乎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的了”(方璧:《鲁迅论》,1927年)。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水到渠成似地出现了瞿秋白这篇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鲁迅研究史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年)②。

鲁迅在自己的生前,不仅已经获得中国文化界的高度评价,而且还吸引了外国文化界愈来愈多的注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衷心称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至于鲁迅逝世时在棺槨上覆盖的“民族魂”这三个大字,可以说是象征着整个中华民族,对于这位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最好的理解。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精辟概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为什么说鲁迅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在中国文化向崭新前景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他究竟代表了哪些关键和深刻的方面呢?鲁迅认为“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从而得到自己崭新的发展。那么鲁迅对于中国古老而又悠久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杰出的见解呢?他为什么要这样痛心疾首而又不无偏激地揭露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大的痼弊?他在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和主导线索进行澄清的同时,又是如何肯定和选择其中许多合理与健康的成分呢?他怎样主张在中国广阔的思想文化土壤中间,建立生气蓬勃和无限美好的新文化呢?研究这样的课题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向前迈进,都可以产生

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始终未能出现这种研究的趋势。

全国解放之后的鲁迅研究工作 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大成绩的，鲁迅研究论著的大量发表和出版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无疑是阐述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高度成就的一种大普及，对于提高广大读者思想深度和审美情操是大有好处的。在这种大普及的局面中间，确实也出现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以研究鲁迅而著名于学术界的人士为数不少，其中尤以茅盾、周扬、林默涵、冯雪峰、李何林、王瑶、唐弢和陈涌等的研究论著，对于鲁迅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左”倾的社会和文艺思潮，而且还变得愈益严重起来，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能力，鲁迅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同样出现了不敢进行独创性探索的弊病，这样就无法出现更为广阔的思考和更为深入的研究，象有些属于鲁迅思想中的重要问题，诸如他对于“致人性于全”以及“立人”的主张，如果在当时那种气氛中进行科学讨论的话，很可能会有被视为宣扬人性论之虞；至于他关于“国民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种种见解，在当时竟被认为是鲁迅思想局限和缺陷的表现^③，这些都是妨碍鲁迅研究深入进行的明显例证。

至于在“文革”时期的十年浩劫中，鲁迅研究也象其它领域的学术探讨一样，不可能获得正常的进行。鲁迅在当时还被歪曲成为全知全能和善于挾伐的先验之神，这种来自指导思想方面的主观意图上失真的神化，不能不转化成为客观效果上畸形的丑化，从而导致了不青年读者对鲁迅产生误解和反感。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摒弃基本法制的混乱和蒙昧状态，终于被有力地制止了，从而步入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清明局面，近十多年来在这种逐步趋于健康的氛围中间，鲁迅研究工作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明显的是走向准确和深入，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自然也不是说鲁

迅研究就不存在什么缺点了，譬如说一方面存在着思想上解放和开拓还不够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缺乏鲁迅那种“拿来主义”的科学精神，出现了一种盲目崇洋的倾向，机械地搬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某些模式，用这种新模式来代替陈旧的老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丧失独创性的表现，那些充斥着被讥之为新名词狂轰滥炸的套话和空话，对于推动研究工作的迈进其实是并无意义的。当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在渐趋健康与正常的学术氛围中间，得到应有的克服和解决的。

二 文学视角的研究

长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了上亿万字的研究论著，其中确实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研究视角，也确实在探讨着许多不同领域的问题，不过绝大部分却都是侧重或立足于从文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鲁迅确乎是最为集中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家类型的伟大文学家，除开《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这两部专著，以及少数几篇涉及文化和科学的学术论文之外，他绝大部分精辟和深刻的思想见解，几乎都是通过文学体裁作品的审美途径表达出来，小说、诗歌和散文自然不用说了，就是在整部《鲁迅全集》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杂文，其中所含渊博、精辟和深湛的思想内容，也都是通过犀利浑茫和感情浓郁的文笔，在璀璨夺目的艺术光辉中照射出来的。

就文学视角的研究而言，可以大致归结为对于鲁迅文艺思想和创作成就的研究这两大方面。无论是对于前者这种思想主张的理论分析，或者是对于后者这种创造实践的审美评述，肯定都可以看出在文学家鲁迅的背后，呈现出了伟大思想家的风貌。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自然是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出现过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篇章，然而我们又绝对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尤其

是因为经过很长一段“左”倾思潮的束缚与禁锢，在这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也还不是生气蓬勃和充满独创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这十多年中间，已经有不少鲁迅研究者澄清了这些存在的问题，使自己写出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确实应该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步。

对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必然要涉及不少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文学的审美作用与社会效应；文学艺术家的气质、心理、感情、精神与思想等等，鲁迅都曾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与发扬。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的看法，为什么他历来都如此坚定地主张“抱诚守真”（《坟·摩罗诗力说》）、“真的声音”（《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和“正视现实的勇气”（《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是因为他深切地了解中国的文艺思潮史，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间，确实是顽强地存在着一种“瞒和骗的文艺”（《坟·论睁了眼看》），这样就从思想文化的广阔背景中间，认识了渗透于其中的国民性痼弊，从而深刻地省察和把握了文艺的本质规律，认为它如果违背真实，趋于虚假，就会从根本上背离观照和叙述生活的审美作用，以及指出和催促它前进的社会效应，所以弄虚作假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必然会丧失自己的生命，并且会变成一种麻醉和蒙骗人们的东西，产生鲁迅所指斥的“瞒和骗”的作用，这样才牢固地形成了他坚持发扬文学艺术真实性的要求。鲁迅这种见解确实是抓住了文学艺术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对此也应该进一步作出崭新的研究。

鲁迅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些创作方法及文学思潮的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异常杰出的意义。鲁迅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与实践者，他在这方面不少精辟的见解直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启迪作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更是将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这些文学大师所开拓的道路，引向更为宽广和深邃的前景，他的现实主义主张是“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命运”，因为读者“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象这样将深情倾注于整个民族的命运，既要诉说他们在“铁屋子”里那些深刻的悲剧与喜剧，又要用“亮色”去思考和指点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鲁迅上述的这些思想见解，无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的。

比起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来，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就出现更多了，而且确实也作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不过总的说来是微观性的思想与艺术分析比较多，而缺乏更为宏观性的比较和对照研究。从后者的这种角度去进行研究，难度自然要大得多，因为它需要更为广博和精深的历史知识，更为敏锐和细腻审美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将鲁迅创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置于中华民族艰苦搏战的历史背景和渗透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精神氛围中，将它与同时代出现的中国小说，还进一步扩大到与二十世纪以及整部外国文学史上涌现出来的许多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而这样的研究自然又得要了解整部外国文学史后面的历史背景和精神氛围，只有经过这样广博和精湛的研究，才可能充分发掘和阐述出文学大师鲁迅，很不相同于一切其他巨匠的思想艺术个性，以及又将这些丰富复杂的因子融合在一起的独特魅力。

对于鲁迅杂文也应该进行很认真的研究，鲁迅杂文无疑是对整部世界文学史的巨大贡献，比起这部文学史中间诸如蒙田、培根和帕斯卡尔这些大散文家的篇章来，更充满了激烈的心灵呼号和深邃的文化气息，以及他们都难以企及的艺术光采。对鲁迅杂文的思想内涵与文体特征研究得都还不够，而且在海内外还有少数研究者在贬抑鲁迅的杂文，正好显示了他们学识与修养的浅薄，还不足于理解它珍贵的价值，对此应该进行必要的澄清与探讨，这样肯定会有利于提高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准。

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思想的解放与视野的开阔,从文学视角进一步剖析鲁迅的研究工作,完全有可能取得更为重大的成就,这任务自然也还是十分艰巨的,它正在等待和吸引着广大鲁迅研究者深入的耕耘。

三 应该引向文化范畴的考察

鲁迅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家气质的伟大文学家,他的小说在挖掘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狂人日记》),在剖析着人们之间的冷漠和隔膜(《孔乙己》、《明天》和《故乡》),在揭示着国民性的痼弊(《阿Q正传》、《示众》),在悲叹着具有现代文明的新生活秩序之难于确立(《药》、《风波》、《祝福》、《离婚》),在惋惜着担负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之悲剧道路(《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不过鲁迅还不仅是这样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伟大作家,而且也还是远远超越了文学这个范畴的伟大思想家。

鲁迅提出了许多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杰出命题,其中包含的思想都带上了自己特有的光采和难以企及的深刻性,如“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坟·科学史教篇》);“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坟·灯下漫笔》);“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们敢于明言”(《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花边文学·倒提》);“‘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

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等等。

从上述这些简略的举例中间，也可以看出鲁迅的视野异常宽广，他总是关注着整个民族和全部人类生活的命运，关注着他们精神面貌的种种表现趋势及其形成的原因，并且竭力企图改变其中畸形与缺失的方面，渴望着能够出现一个正常、合理和健康发展的前途。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人类社会在复杂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制度，鲁迅对此始终是给予重视的，他尤其关怀着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中所形成的那种社会制度，以及它跟广大人们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之间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鲁迅充分看到它们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恶性循环，影响和危及着整个民族的生机，因此他迫切地思考着如何能够促使这两者之间能够获得一种良性的循环。而他自己则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考察人们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这范围之内的许多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鲁迅所思考的这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如何更好建设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问题，而他对于精神文化问题的思考，不仅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间，甚至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上也可以说是最为杰出的。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后期思想阶段，鲁迅就更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存废”“民众的大层中”的“风俗习惯”上边，认为离开了此点的任何一种“改革”，不是被它所“压碎”，就是“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风俗习惯”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思想层面中最为普及的一种表现，它烙印于广大人们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中间，制约和决定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鲁迅从早年敏锐地提倡个性解放开始，归结于深刻地把握对“风俗习惯”的“改革”，这其实是一脉相承而又更趋深广了，他这种思想线索的进展，实际上也都可以认为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种广泛探讨。令人惋惜的是这个重大的研究课题竟未能引起研究者充分的注意，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鲁迅的论著确实是出现

得太少了，这里自然有研究者主观方面的素质和修养问题，更多的却还是客观的环境和氛围，并未充分形成研究这一问题的成熟条件。在目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应该是向这一方面拓宽自己研究视野和领域的大好时机，近年来对此的研究确实也有所增加，迫切地盼望着涌现出更多从文化视角研究鲁迅的论著，这对于学术水平的提高肯定是很意义的。

由于鲁迅正处于中国文化史由古代趋向现代的这种转型期内，因而就使他充分体现了这种紧张激烈和丰富复杂的剧变趋势，正由于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异常沉重的负荷，他才会以自己整个身心为新文化在中国广阔土壤上的出现而献身拚搏。他既充分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史的昨天，又将自己的视野投向整个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轨迹，他从启蒙主义的起点出发，最终归结于服膺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伟大思想家。他这样就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地俯视历史和时代，在充分的比较与参照中阐述和预测着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张。他一方面在努力澄清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不能适应于二十世纪现代生活秩序的整体框架与主导线索；另一方面又严肃认真地继承与发扬其中许多健康合理和依旧充满了生命力的因子，并且企图在自己民族血脉所灌注的广垠的土壤上，借鉴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却又摒弃其中从社会效应来说是并不健康的素质，以及从审美角度来说是不太适应于自己民族的成份，积极而又慎重地思考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新文化，研究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确实是应该摆上我们的日程了。

鲁迅毕生从事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主义工作，即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他的这种工作大致说来包括如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国民性”的改造，力图荡涤那种不合理的旧制度对整个民族精神所产生的腐蚀作用，从而去建设一种健康合理和美好向上的国民性，使得自己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成

为具有现代平等意识的公民；其二是“人性的解放”及其趋于全面的发展，他早年对“致人性于全”的坚定追求，使得自己对资本主义文明束缚和扭曲人们精神的种种锢弊有所觉察，这就与马克思主义要求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近似之处，正是这样的探讨无疑也成为他后来服膺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契机。研究鲁迅对这些文化问题许多杰出的见解，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化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又考察与分析他全部见解中所包含的缺失与偏颇之处，并且对出现这两个方面深刻的思想与历史原因，也相应作出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这无疑都是十分需要进行的工作。

四 鲁迅的精神风貌

从鲁迅的全部著作中间，充分显露出他具有一种异常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他既有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又有激昂和浓郁的感情；既有生动和活跃的形象，又有浩瀚和丰腴的文采。这种集思想、热情、形象和文采于一身的精神风貌，使鲁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华照人的杰出人物。他固然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具有思想家类型的创作家，同时却又是一位具有创作家类型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他有些类似于叔本华和尼采，而迥异于康德和黑格尔。正是这种相似精神气质的吸引，无疑也是他长期接受尼采影响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有不少论文从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文化背景的详尽比较中，分析和阐述了鲁迅与尼采的异同，以及各自所产生的不同思想影响，却很少有从心理气质与精神风貌的角度对他们作出比较，希望能够看到这种充满了趣味和启迪性的论文尽早出现。

至于说到鲁迅和康德、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也是一个会十分吸引研究者的题目，鲁迅确实不象他们那样是思辨性很强的思想家，后者的思想体系往往通过他们详尽展开和阐述的逻